

何兹全 主编



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汉赵史论稿

——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

陈 勇 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主编 何兹全

汉赵史论稿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赵史论稿/陈勇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06067-7

I. 汉… II. 陈… III. 中国—古代史—前赵(304~
329)—文集 IV. K238.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1541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资助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汉赵史论稿

陈 勇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龙 兴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06067-7

2009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 %

定价: 24.00 元

总 序

何 兹 全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与发展,我们策划组织了《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并把它作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主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有重视中国社会与政治史研究的传统。解放初期,侯外庐同志任历史系主任,为重视社会与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后多年在白寿彝教授的主持下,这一传统一直得到了保持并有所发展。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这是坏现象,也是好现象。这正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历史作更深入的研究。

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开始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论文。我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库”之一再版),2003年晁福林教授出版了《先秦社会形态研

2 总序

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两部书,在中国史学界都起到了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作用。

我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很多学有所成,大部分成为高等学校和研究部门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他们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专著和论文。他们也是这套丛书的主要作者。

通观中外学术思想的历史,无论哪一门学科,往往走着一时重思想一时重材料,一时重整体一时重局部的发展路程。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可以引申来说就是偏颇的为害。孔子高明!

中国社会史研究虽然时间尚短,但大体上说,也不免有走这种偏颇道路的情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一出生就是以社会史论战的面貌出现的,偏重理论;不久就出现《食货》派,被认为重材料。解放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自然是重理论的,其结果则是被目为走向教条主义。上世纪80年代后的社会史研究又出现重材料,重局部,重个别社会问题的研究的动向。

历史经验是值得重视的。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不能偏重哪一方面。

理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理论是研究深入中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认识客观的能力。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客观的认识才一步步地深入。

因此,理论和材料的关系是相互为用。要两条腿走路,缺一条腿就成为瘸子。

自古就有这样一句话,说是“坐井观天曰天小。非天小也,所

见者小也”。坐在井里看天，只能看到天的一部分，就说天小。不是天小，是你所看见的小。做学问，要宏观、微观结合。要能真实的看到整个社会，才能认识你看到那一部分社会和问题。研究任何一点一面的社会，必须有全面的观点，认识了社会的全面，才能真正认识你所见的部分。

自古以来，研究学问，往往出现这两者的偏差，不是重宏观、重理论，就是重微观、重材料。

我们编这套《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要重视历史上所走过的弯路，重视这种偏差。一本书也可能材料多些，也可能理论多些；一本书可能重在宏观，也可能重在微观。但我们希望整套书，是在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这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正路，是做学问的正路，也是我们编这套书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海外商品经济、技术和资本涌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学术、史学思潮和著作也涌入中国。辩证唯物史观一时有进入低潮的趋势。这是学术因素以外的人为原因造成的。辩证唯物史观还有极强的生命力，是先进的。

我们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以辩证唯物史观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我们坚持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道路，避免偏颇，并决定从《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做起，以后再逐步扩展，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推动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目 录

绪论 五胡入主中原的短暂序幕——汉赵国历史	
与政治的特征	1
一、匈奴的历史记忆与五部的政治重组	1
二、屠各称谓衍变与入塞匈奴的地域化	6
三、胡汉官制并存与军国体制的确立	11
四、胡汉分治背景下匈奴与六夷的联盟	16
《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	20
一、《史记》所见战国时代的匈奴称谓	21
二、秦汉之际胡与匈奴称谓的混淆	33
屠各称谓衍变与部落迁移——入塞匈奴的地域化问题	45
一、屠各称谓衍变的两种假说	46
二、屠各称谓衍变与部落迁移	54
匈奴、屠各并举与屠各的豪贵地位	61
一、诸史匈奴、屠各并举置疑	61
二、并州屠各“豪贵”地位的形成	67
三、并州屠各与南匈奴的合流	76
去卑监国的败局与刘豹世系的造伪	87
一、南匈奴分裂后於扶罗部的动向	87

2 目录

二、去卑监国与南匈奴诸部的衰落	91
三、并州屠各崛起与刘豹统一五部	97
四、刘豹世系的造伪与刘猛起兵	104
刘渊的质任身份与五部的政治重组	111
一、曹操划分五部与刘氏专任部帅	111
二、屠各主导五部与刘渊留质洛阳	118
三、五部重新整合与刘渊将兵在邺	124
汉赵国胡与屠各异同考——兼说汉赵国的胡汉分治	130
一、并州屠各非汉赵国六夷之胡	130
二、汉赵国屠各与六夷的分治	145
汉国匈奴、氐人联盟的解体——以刘义案为中心	163
一、刘义身世之谜与匈奴、氐人联盟的建立	163
二、氐人的政治动向与刘聪让位的隐情	171
三、刘义案发生与匈奴、氐人联盟的解体	180
后赵羯胡为流寓河北之并州杂胡说	189
一、后赵建国前后羯胡人口变化探微	190
二、河北羯胡的来源与石勒的“并州之思”	196
三、国人体制的确立与羯胡阵容的扩展	203
附录一 《资治通鉴》汉赵国事迹考证	212
附录二 汉赵国官制拾零	292
附录三 两汉魏晋南北朝屠各称谓表	317
附录四 汉赵国诸王表	325
附录五 汉赵国职官表	328
参考文献	346
后 记	354

绪论 五胡入主中原的短暂序幕

——汉赵国历史与政治的特征

公元四世纪前叶，匈奴屠各部所建立的汉赵国（304—329），在五胡中首次实现对北部中国的统治，为十六国北朝的历史拉开了序幕。笔者观察汉赵国的兴衰之迹，有两个问题始终萦绕于心：其一，汉晋之间入塞匈奴部落颇多，何以仅有屠各始终存在？其二，率先入主中原的屠各刘氏，其国运何以又极为短促？本书的构思，即尝试从文献入手，并结合其他资料，为以上两个问题寻找答案。

一、匈奴的历史记忆与五部的政治重组

五胡建国，以特定的部族或地域群体作为其核心集团，这在以往史家的研究中，已形成一种共识。汉赵国在政治、军事上所凭借的核心集团，是晋人习称“五部”的匈奴五部之众。该集团的主要特征之一，则是利用对匈奴族群、文化的记忆，构建出地缘乃至血缘的联系，形成特殊的内部凝聚。西晋惠帝末年，刘宣等人鼓动五部起兵，明确提出“兴邦复业”的口号，按他们进一步的阐释，指的

2 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

是“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①刘渊以大单于名义举事，又恢复了匈奴的王位系统。刘宣、刘渊的这些做法，都是在利用匈奴的政治传统，争取五部之众的拥护。此时的五部之众，可信是以呼韩邪为共同祖先的入塞北族人群。而有关匈奴的历史记忆，又成为汉赵国核心集团成员彼此联系的重要政治文化资源。正是由于屠各刘氏对匈奴传统的张扬，使得他们在匈奴、杂胡乃至五胡群体中得到普遍认同，并在政治、军事上获得广泛支持。并州屠各、南匈奴以及六夷诸部麇集在大单于刘渊麾下，对汉族的西晋政权就形成了空前的颠覆力量。

匈奴五部之众成为汉赵国的核心集团，是进入五部地区的入塞北族各部长期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关系演变的主轴，则是并州屠各与南匈奴两大势力的消长聚散。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匈奴浑邪王挟休屠王部众归汉，至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元熙元年，304）屠各首领刘渊称王，前后四百二十余年，入塞匈奴名王、部落数量之多，不胜枚举，《晋书》卷九七《北狄·匈奴传》所列北狄十九种，更是人所习知。然而西晋末年，绝大多数入塞匈奴名王、部落都已销声匿迹，只有屠各保持其部落称号，并成为“统领诸种”的“最豪贵”一族，^②这个现象引人深思。笔者以为，入塞匈奴名王、部落汉晋之间大批“蒸发”，其实是被其他部落所兼并；而并州屠各在北族各部的长期互动中，无疑处在一个关键的位置。该部落历经四个多世纪依然十分活跃，其实是充当了主要兼并者的角色。

① 《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47、2648页。（本书引用廿四史，一律采用中华书局标点本，下文不再标注版本，只标页码。）

② 《晋书》卷九七《北狄·匈奴传》，第2550页。

唐长孺先生说：“所谓‘屠各种最豪贵，故得为单于’，仅仅适用于刘渊起事之后。”^①并州屠各的崛起始于刘渊或刘豹的一代，与南单于羌渠、於扶罗、呼厨泉及右贤王去卑在血缘上并无牵涉。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将南单于呼厨泉留质于邺，又将并州境内的南匈奴之众分为五部。以南单于为首的南匈奴贵族丧失了对五部的指导地位，汉末介入南匈奴内部纷争的并州屠各则乘机而起，取代南匈奴，成为五部地区最强大的北族势力。魏末咸熙年间，并州屠各首领刘豹统一五部，就是这个过程中关键的一步。《晋书·北狄·匈奴传》称入塞匈奴中屠各种“最豪贵”，大概与刘豹的兴起有关，反映了五部入晋前后的实际状况。

并州屠各实力的急剧增长，改变了五部旧有的政治格局。该地区改姓的潮流，其实是并州屠各与南匈奴重组的一个信号，结果是南匈奴诸部一致向新的统治者——并州屠各表示臣服。唐长孺先生说：“刘渊的假托世系，自然首先要取得匈奴贵族刘宣等的承认。”又说：“刘宣等凭借屠各实力而假以南单于世嫡之空名，企图恢复匈奴旧业，这样就造成了合作。”^②正是着眼于此的。改姓后的屠各刘氏，占据传统上由南匈奴虚连题氏垄断的王位，成为并州屠各与南匈奴政治联盟的领袖。刘渊在西晋官方的记录中标明是“匈奴人”，也被赋予特殊意义，显示此人已具备“统领”入塞匈奴诸种的资格。而到汉赵史家的笔下，他又成为南单于嫡系、羌渠的后人。改姓后的南匈奴贵族如须卜、丘林、靳诸氏，变为屠各贵族。

① 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398页。

② 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02页。

4 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

其他南匈奴贵族如呼延、兰诸氏,大概也跻身屠各贵族的行列。至于羌渠系统的南单于一族,在屠各刘氏承接南单于血统之后,已变为并州屠各的王族。汉赵国内的南匈奴诸姓在诸史中往往被说成屠各,原因可能就在这里。以往分属不同部族的并州屠各与南匈奴,通过改姓等途径,组成以匈奴为同一族源的新的共同体,“五部”则是这个共同体对外的称号。

东汉末年出现在并州的休屠(屠各)部落,魏晋之际为南匈奴诸部所接纳。晋武帝泰始七年(271)去卑子、中部帅刘猛起兵叛晋,其余四部迄未响应,南匈奴余众拒绝追随南单于后裔,而选择与并州屠各合作,五部内部的政治变化是相当深刻的。史籍中所见参与汉国建国的屠各族人,除并州屠各刘氏以外,只有南匈奴贵族诸姓。此事让人产生了一些疑问:两晋之际的“五部”与“屠各”两组人群是否重叠?二者是否只是汉赵国核心集团的不同面相?曹魏末年五部都尉所统约三万落^①,一般估计在二十万人以上;^②晋武帝元康九年(299)江统撰《徙戎论》,又提到五部之众户至数万^③。可是,按照刘宣等人晋惠帝永安元年(304)策动五部起兵时的说法,刘渊所能

① 《晋书》卷九七《北狄·匈奴传》:“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第2548页。另据《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五部改置都尉,在太康年间(280—289)。第2647页。以上《晋书·北狄·匈奴传》关于五部落数的统计,究竟是魏末还是西晋太康年间之事,难于判定。

② 周伟洲:《汉赵国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页;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0页。

③ 《晋书》卷五六《江统传》载元康九年(299)江统所撰《徙戎论》:“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第1534页。《江统传》记此《论》作于氏帅齐万年被擒时,即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可知刘渊起兵前五、六年,五部的规模臻于极盛。

控制的人口仅有二万多人，^①与曹魏末年及西晋中期的五部人口都相差甚远。汉国建国之际的“屠各”，究竟是指“五部”全体，还是仅指其主要的部分，尚难断言。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说，活动在西晋末年的屠各刘氏与南匈奴贵族，即那批见于记载的“屠各”族人，正是“五部”集团的骨干成员。

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树机能攻陷凉州，上党李熹主张“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元海一将军之号，鼓行而西”。李氏将“五部”冠以“匈奴”之名，应该是西晋流行的做法，反映了时人普遍的观念。晋惠帝元康永宁之际，刘渊被成都王颖留质于邺。永兴元年(304)，并州刺史东瀛公腾、安北将军王浚率乌桓、鲜卑攻成都王颖，刘渊向成都王颖建议，由他本人“还说五部”，并称“以二部摧东瀛，三部枭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矣”。^②刘渊此言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我们由此获知，经过刘豹、刘渊、刘聪三代人的经营，五部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军事单位，屠各首领刘渊则已具备调动五部的能力。

① 《资治通鉴》卷八五晋惠帝永兴元年(304)载刘宣煽动五部起兵之语曰：“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无复尺土；自余王侯，降同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左贤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兴匈奴，必不虚生此人也。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矣！”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699页。周师一良说：其中“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数句，“不见于《载记》和汤辑《十六国春秋》。我猜想是崔鸿的原文，唐修《晋书》省略，而司马温公时还未亡佚，所以录入《通鉴》”。见所撰《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7页。其时刘渊随成都王颖在邺，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马长寿先生说：“此‘二万’当指刘渊为监军时的匈奴人口。”见所撰《北狄与匈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12页。

② 《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第2648页。

我们注意到,刘宣、刘渊在论及其先辈或部族渊源时,都不提他们所熟悉的羌渠、於扶罗、呼厨泉或刘豹,而是上溯匈奴远祖,似乎有意回避入塞匈奴部族之间的分野。刘宣等人在刘渊起兵后追忆往事,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云云,^①又将多年前被五部中的四部排斥的刘猛,重新归入新立的大单于刘渊一族。这类事例证明,并州屠各与南匈奴的界限相当模糊,双方的融合大致已完成。我们进一步又可以说,并州屠各与南匈奴的融合,造就了以屠各为主干的五部共同体,该共同体在刘渊建国之际担当了核心的角色,发挥出足以震慑北部中国的强大武力,从而吸引大批反晋的胡汉民众加盟,这是入塞匈奴在五胡中率先入主中原的基本前提。

二、屠各称谓衍变与入塞匈奴的地域化

汉魏之间各种与屠各相关的称谓,都是由“休屠”及“休著各”派生,并最终定型为“休屠各”或“屠各”的。用汉字记录包括异族族名在内的外来语,东汉以前已有一字或两字转写的不同形式,而后一种形式,又与汉字的反切注音近似。诸史有关“休著各”、“休屠各”的记录,集中在桓、灵两代,汉字注音方式由直音向反切的转变,也发生在东汉末年,这可能不是一种巧合。包括休屠在内的入塞北族各部,长期与汉人比邻或混杂而居,并反

^① 《晋书》卷一〇—《刘元海载记》,第2648页。

复为两汉王朝所控制，他们在中原地区所使用的称谓，尤其是被官方认可的正式称谓，必然受到汉族语音及标注方式的影响。“休著各”中的“著各”二字，可能是“休屠”之“屠”的转写。两汉时匈奴单于姓氏由“挛鞮”到“虚连题”的变化，为此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休屠部众在脱离其西汉原徙之地后改称“休著各”，又讹变为“休屠各”乃至“屠各”，他们留在河西的部落却依旧以“休屠”为名。此例证明“休著各”、“休屠各”等称谓的出现，可能与该部落的迁徙有关。“休屠”、“休著各”、“休屠各”、“屠各”等各种屠各称谓的并用，实际上取决于屠各各支所在地域的不同。屠各部落在不同地区使用不同称谓，主要又是由当地的方音所决定的。匈奴休屠王部落选择汉译名称“休屠”，应与该部落最初落脚的河西方音有关。休屠部众脱离河西向东南迁徙，或出塞后由并州北边再度入塞，“休屠”称谓的语音可能也随之变化。“休屠”所在的河西与“休著各”、“休屠各”所在的并州中、北部，按《方言》的划分属于不同的方言区，河西在“秦晋之间”，并州中、北部则为“晋之北鄙”。“休屠”迁入并州而改称“休著各”或“休屠各”，可能又是受“晋之北鄙”方言的影响。

我们由此勾勒出屠各称谓变化的大致过程：西汉武帝时，匈奴休屠王部众在河西武威一带定居，被当地土著居民及西汉官方称为“休屠”；东汉安帝以后，“休著”被用作“休屠”的转写，并与“休屠”一同成为休屠部落的称谓；此后，休屠部族中的一部分人迁往陇右、五原、西河，其称谓则转写为“休著各”，或是按照当地语言习惯，增加“各”字作为语缀，进而衍变为“休屠各”、“休著屠各”，又简

化为“屠各”。

魏晋时屠各的分布极为广泛,而且往往冠以地域名称,据唐长孺、马长寿先生统计,有西山屠各、赵郡屠各、秦陇屠各、渭北屠各、高平屠各、凉州屠各、姑臧屠各、并州屠各八种。^①十六国北朝时以地名标注的屠各称谓,数量则更多。屠各称谓与各类特定地名的结合,反映了内迁少数民族部落或部族的地域化倾向。中古各少数民族受其迁徙环境的影响,往往形成以地域为中心的群体认同;其内部的社会政治结构亦相应调整,并影响到他们与周边民族的互动关系。以并州屠各为主干的匈奴五部的兴衰变化,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证。魏晋时活动于汾水中下游的入塞匈奴各部,经过反复的政治重组,整合为习称“五部”的地域共同体,并州屠各首领刘渊正是以此作为立国的根基。

刘渊起兵之初,在与刘宣等人商议征讨鲜卑时说:“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塿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②此处“汉高之业”与“魏氏”对举,无疑是指西汉的大一统局面。永安元年(304),汉大将军刘景为晋并州刺史刘琨所败,晋阳失守,汉国朝臣中曾出现移都的动议,他们的规划是“命将四出,决机一掷,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此议根据刘邦建国的经验,所以倡议者又说:“此高皇帝之所以创启鸿基,

^① 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82—396页;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第95页。

^② 《晋书》卷一〇—《刘元海载记》,第2649页。

克殄强楚者也。”^①刘渊当时感叹：“此孤心也。”似乎也有西据关中进而席卷中国的志向。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刘渊、刘聪始终未将都城迁出平阳,他们坚持将帝国的政治中心置于五部故地南端,成为汉赵国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诸史所载汉赵国都城的变化大体如下:晋惠帝永安元年(304)刘渊起兵于左国城,旋即都于离石;^②此后一度迁回左国城,^③同年,因离石大饥而迁都黎亭;汉军进据河东,攻陷蒲阪、平阳,又入都蒲子;^④晋怀帝永嘉二年刘渊称帝,移都平阳;^⑤刘聪继位,仍定都平阳。此后直到晋元帝太兴元年(318)汉国内乱,刘曜才放弃平阳而西迁。《晋书》卷一〇〇《王弥传》:刘曜入洛阳,

① 《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上下文为:“是岁,离石大饥,迁于黎亭,以就邸阁谷,留其太尉刘宏、护军马景守离石,使大司农卜豫运粮以给之。以其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要击并州刺史刘琨于版桥,为琨所败,琨遂据晋阳。其侍中刘殷、王育进谏元海曰:‘殿下自起兵以来,渐已一周,而颺守偏方,王威未震。诚能命将四出,决机一掷,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创启鸿基,克殄强楚者也。’元海悦曰:‘此孤心也。’”第2650页。

② 《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载刘渊起兵事云:“元海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众已五万,都于离石。”第2648页。

③ 《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王浚使将军祁弘率鲜卑攻郿,颖败,挟天子南奔洛阳。元海……命右于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将讨鲜卑。刘宣等固谏……乃迁于左国城,远人归附者数万。”第2648、2649页。

④ 《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是岁,离石大饥,迁于黎亭,以就邸阁谷,留其太尉刘宏、护军马景守离石,使大司农卜豫运粮以给之。……进据河东,攻寇蒲阪、平阳,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东、平阳属县垒壁尽降。”第2650页。

⑤ 《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永风。……太史令宣于修之言于元海曰:‘陛下虽龙兴凤翔,奄受大命,然遗晋未殄,皇居仄陋,紫宫之变,犹钟晋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阳。蒲子崎岖,非可久安。平阳势有紫气,兼陶唐旧都,愿陛下上迎乾象,下协坤祥。’于是迁都平阳。”第2651页。